

民國文學史研究

(1912-1949)



吉林大學出版社

民國文學史研究

(1912 - 1949)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文学史研究 / 汤溢泽, 廖广莉著.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 - 7 - 5601 - 8035 - 9

I. ①民… II. ①汤… ②廖… III. ①中国文学 - 文学史研究 - 民国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65167 号

书 名: 民国文学史研究
作 者: 汤溢泽 廖广莉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刘子贵 黄忠杰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 / 16
印张: 26.5 字数: 380 千字
ISBN 978 - 7 - 5601 - 8035 - 9

封面设计: 杨 娟
长沙鑫宇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2011 年 12 月 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 - 89580026/28/29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自 序

关于希望、渴望“民国文学史”之命题成立即“立”，书中所选文章已经阐释；而对于民国元年至38年时区内的文学被贴上的各类标签如新文学、现代文学、20世纪中国文学等的优、缺点，本书里的文章或陈述，或炮轰、狙击，也就是命题的“破”，在此也不再啰嗦。此处只补充几点。

一、“民国文学史”研究的起点：认知中华民国在历史上的地位

孙中山的大炮（有人给予的“美”称为“孙大炮”）轰垮了清廷，但追求民主、共和的他不恋总统宝座，毅然放弃临时大总统那顶红帽，孙先生因此举而被称为中国的华盛顿。两人在极端的权欲熏心者看来，大公得天真、单纯，乃至愚蠢！正因为这些功利主义者所凸显的人心等，导致孙中山、华盛顿建国后的中、美结局有天地之别：美国慢慢变成称霸世界的、内心丑恶的、译名可忽悠为美丽的国家，而中国则成为千疮百孔的战场。民国元年至38年，中国没有哪一天没有枪声、战火，北洋政府南战西斗、广州政府东讨北伐……蒋介石执政于南京后，中国貌似统一，其实统一政权这张牛皮纸包着的是一团烫手火：蒋、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张（学良）等“貌”间或不合，“神”一直远离。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蒋介石采取极致手段打击异己，在战火纷飞的卧榻上搂着娇妻宋美龄做着险胜对手的仲夏夜之梦（也许蒋先生做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南柯梦），同时梦里的他也在与“朱毛”厮杀、与日寇斗法，他们的卧榻不得不折叠成一张流动的军用床，最后演变为弹孔不少的木筏载着庞大的国民党政权机器，带着金银财宝，横渡海峡偏安于中国台湾，从而宣告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热兵器的政权结束了一场金陵春梦。不容他人鼾睡者——蒋介石在大陆从未酣睡过，连卧榻也差点被烧毁，在台湾亦如此，防共、反共复“国”，消灭“台独”……正如李敖所说的手淫台湾、心淫大陆。这就是蒋介石的痛史，也是民国政权的惨史之一，而这段历史却被边缘化乃至蒸发，犹如电视《长征》中泸定桥被过了河的毛泽东气吞山河般的一脚踩着一样。然而毛泽东文武霸威虽永久性地深入人心，但历史最终会浮出水面，民国历史在中国、世界史上是不可抹杀的。

武昌起义后的12月29日，清朝原有的22个行省中业已独立的17个省代表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次年元旦，孙中山到南京就职，开始了中华民

国南京临时政府时期。

袁世凯退位，1912年4月孙中山辞职，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首都迁至北京，至1928年间称为“北洋时期”。在此期间，各个实力派互相争斗，外强趁机变本加厉地鲸吞中华利益。奔波的孙中山等在南方组织政权，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就是后来推翻民国政府居首功者——毛泽东当时就曾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候补委员、代理宣传部长。之后便是国共反目，共产党创立的工农武装星火燎原，蒋介石坐着南京的龙椅上下翘动、左右摇摆。双方在维护民族利益上又一次合作，在日寇惨败后，共产党政权的宣言、行动所指就是推翻蒋家王朝反动统治、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他们用自己的革命武装消灭了蒋介石的反革命武装，哗然一声将其推倒，最终取代了民国“政府”。

而当时麻木的国人虽对谁是自己统治者、政府持漠然态度，但他们手里曾经拿着袁大头交易、揣着垃圾纸币——法币、金元券从事过买卖，也为自己利益请求过民国政府国家机器如审判所等主持公道，即使诉求永远得不到公正、权益永无平等；走中间路线者反对的是蒋介石的专制，他们嘴巴念着“民主”“自由”的美丽经书，但所居庙宇是在民国政府这座大庙笼罩之下，走的也是民国的路、顶着民国的天；而持不同政见的、非武力派如民盟、民革等与民国政府、蒋记政权关系本来暧昧，恩怨如岳沙河西流水，只是老蒋酷好吃独食而没吃独食的全能本领，最后让他们跑到共产党阵营。

这些粗线条说明中华民国取代清政府，符合普世的政府继承原则。末帝退位，清帝不存，政府更迭，中华民国政府掌握着国家的权力，并建立了行使权力的国家统治机关，对全国绝大部分领土和居民进行了控制和管理等等，也就是“有效统治”。虽然这种有效统治具有不彻底性，但张勋复辟、伪满洲国纯为丑陋的、有毒的昙花一现的闹剧，这些并没有动摇中华民国的根基；而国内各方势力混战，也只是在中华民国之中为各自膨胀的私利的内斗。

如果我们真正的遮盖、否认中华民国历史，那么中国历史上1912年—1949年是谁在统治？难道中国这38年无法无天无君？或者是真正的绝对自由之桃花源？抑或是无政府主义者所主张的无统治的试验田在华取得了伟大的成功？

从国际方位来看，北洋政府护国较少、卖国为主，就是卖国也是以国家身份出现的贱卖、血甩，如袁世凯的“二十一条”，又比如代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就是明证。

南京民国政府于1928年7月25日与美国签署了《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标志着美国正式承认了其国际意义上的合法性。抗战时期，日寇

打击主要对象还是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虽然汪精卫、周佛海、周作人等孽障在南京另组一个汪伪国民政府，却也只获日皇、教廷、意大利、纳粹德国、伪满洲国这几个暂时得志的小丑之承认。

日本偷袭珍珠港，蒋介石政府跟着美英正式对日德意宣战，中国战区遂正式成为二战盟军反法西斯战争战场，也是抗击日寇的正面战场。盟军委托蒋介石任中国战区（含越南、泰国、高棉即今柬埔寨、老挝）统帅，派史迪威中将任蒋参谋长。日本无条件投降后，根据《开罗宣言》及《波茨坦宣言》规定，中华民国接收台澎诸岛。

列强历来自私贪婪、信奉实力，即使给我国带来一点好处，其深处也是为谋求自己未来利益计，才种下的几棵甜瓜籽，他们左手举着友邦的幌子、放出几只短命的鸽子，右手干着埋下苦瓜籽的勾当，脑袋盘算着秒杀我国的毒计，瞒天过海、障人眼目、蚕食中华等无时不有。但不论其居心何在、手段何种，他们曾经承认在1912年至1949年10月的中华民国为合法政权，则是铁钉钉板的事实，而且当时的民国政府为联合国五大常务理事国之一，只是蒋介石政府没有把握好机会，遇到共产党这样强大对手才败走台湾。

胜利者凯旋后获得的是鲜花、赞美，从德胜门鱼贯进出；失败者溃散后得到的则是苦酒、贬斥，落草为“匪”，属于斩草除根的对象，但我们不能否认后者的历史。历史上哪个政权愿意放弃自己既得利益，而拱手出让权力？哪个朝代不是或被义军摧毁、或被汉人视为外强的政权消灭的呢？我们不是没有忘记秦汉隋唐，也记住了宋元明清吗？我们撇开民国“政府”苟且于台湾的偏安史，如因其政权不强，而边缘化、虚化、零化它在大陆存续的38年，那么被刘、项推翻的秦朝也得赶出历史范畴，被“闯王”闯毁的朱明也要走出历史小区，尤其与民国时间相似的隋朝则只为一缕青烟在历史这口坟墓上化为乌有了，事实上我们没有超越隋代，史学家们对大运河的开通、对杨广的淫乱残暴、对李渊起兵……一直津津乐道着。同理，我们对中华民国史没有必要因为政治、权力原因而忌讳、而跨越。

二、“民国文学史”研究方法与体系

承认中华民国在历史上的正统地位，让民国史走出如夫人那可怜境地、得到扶正是研究民国文学史的前提，亦可以不斯文地拔高为历史研究法，为科学、客观、实事求是的通世法。除此外，尚有其他方法值得一提。

首先借鉴现代文学的方法论。民国元年至38年的文学史观虽被“现代文学”等解构、占据着，我们力挺“民国文学史”取而代之，但并非像木盆泼水，把现代文学这样洗澡水、连同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这样的洗澡巾哗地倒入

肮脏的黄浦江，而应该留下、拿来后者。我们看到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的现代文学研究的每一步深化、拓展都与方法的更新、变化相联系，都是运用新方法研究的结果。几十年来，学者们吸收、借鉴西方当代大量的方法诸如精神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原型批评、叙事学、分析学、新历史主义等等，这些对于“民国文学史”研究来说，不失为可行的战术。

另外，从事“民国文学史”研究者应具备点全局性的眼光，即综合性研究方法。这种综合性研究方法能将研究者顶高一点，使其站在更高的视点，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审视研究对象，避免疏漏或以偏概全。其次还要有比较的眼光。民国文学本身就是在与东西文化的交融、碰撞中诞生的，又对世界文学产生影响。因此，比较文学意识的强化对“民国文学史”研究至关重要。此外还要有点未来的眼光。“民国文学史”研究者应有学术研究的未来视野，拥有一些必备的学术素养和情怀，用博深而宏大的学术眼光像 X 光一样透视民国文学，只有这样，所从事的研究才能全面、深入、系统，才能插入“民国文学史”内核，寻到其本来面目。这样就等于做出一道研究界的佛跳墙佳肴。

“民国文学史”体系的建立具有特殊性。“现代文学”的名字以威权方式进入政治化的学术成为人们注经的指南，再推广应用于学校教育，使之根深蒂固。长期以来我们都在“现代文学”学科政治规定的影响下研习文学史，其“性质”、“主流”、“分期”对我们的影响根深、开花、果实累累，这使我们在对“民国文学史”进行阐释、评价时都受到了严重的非历史理性、非审美判断的影响。在我们所接触的文学史书中，几乎无一例外都有“扬共贬国”的思想，对我们正确理解这一时期的文学形成了很大障碍。所以，“民国文学史”的建立必须摆脱长期以来“现代文学”的影响，要彻底摆脱“扬共贬国”的政治思维。对执政的国民党与在野的共产党争锋要以全局性、多元化、客观方法进行研究，对民国时期各种文学现象、作品等，我们既不以任何本位姿态放逐任何一方，也不抬高任何一家，既不过分抬高“解放区”、“无产阶级”文学及作家，也不刻意贬低“沦陷区”、“国统区”、“资产阶级”文学及作家，而应当在民国文化格局的重新清理和分析的基础上，建构新的“民国文学”的阐释框架，使“民国文学史”成为一个有机整体。

面对着民国文学的复杂性，“民国文学史”研究尽力从“还原文学史”入手，以“革新”的姿态进行研究和评价。对“民国文学史”的研究要在旧有格局的基础上加上新进展，使之逐渐成为全新的民国文学学科体系。但由于学术研究的学术背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阐述文学史的理论 and 角度不可避免地也要发生根本性位移，即使旧有学科体系中的内容和格局也必须在新的眼

光的观照下、被加以“革新”，所以要在共同的历史思维、文学定力的基础上，才能真正建立起“民国文学史”体系。

“民国文学史”的理论体系框架还应具有历史逻辑的、一定的理论普适性和包容性。文学研究不应该人为地强调过去与当下的二元对立，而割裂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意义，像只认爷爷与自己孩子，忘记中间的父母。我们有必要保持在历史不争的事实基础上形成的文学史观的连续性、同一性，同时又要阐释当下的独特性与唯一性。所以，在“现代文学”等基础上扩大其外延性和包容性，不但要接纳“五四”新文学，还要包容以鸳鸯蝴蝶派为主要特征的旧派文学，同时也不遮蔽言情、侦探、武侠之类的旧通俗文学，旧派文学的诗词格律，日伪沦陷区的汉奸文学，日常生活文学等，除此之外也要将此时期的政治、经济、道德等因素包容在内。

目前，嫩芽般的“民国文学史”没有获得官方认可的“显学”准生证，需要努力（甚至包含猫腻猫腻）才可能上户。其实真正的学科研究是有兴趣者在楠木、红豆杉、香榧树丛中狩猎，在远离喧嚣都市的山溪边垂钓，所得的原生态级别的山珍水味，只要有所思所想所得，精神有所愉悦，对问题的解剖有益于读者即可，不必依附于大树，更不必在乎自己产品被戳上某某官方、某某学会认可的鲜红滴血的印章。走入所谓学术领域并非何等神秘、乃至装腔作势的做作，而应是简朴得如同百姓行路，大路朝天各行一边，得到权力支持者继续打造庞大的、吓人的文学大厦，我们也可以平整 1912 年—1949 年这块文学土地，打牢地基、建筑江南民居式的学术体系殿堂。

从纵向看，“民国文学史”上承明清文学、下接新中国文学。她的源头继承了先代文学尤其是清末文艺新思潮，开辟了一个文学新纪元，同时深刻影响 1949 年后的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文学；从横向看，她并非被动地接受一切西学，而是在强大的中华文学定力基础上吸收东西文化，反过来推动全人类文学的发展。同时将当时中国范畴内，各种文体、文学思潮、文学流派、文学团体，各党派支持、打压的文艺，各民族文学作品全部融入，细心雕琢，再时毫地给力，“民国文学史”体系则成为耀眼的东方明珠，价可敌国！当然我们用民国文学的源头、民国文学环境、民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民国文学特点、民国文学现象、民国文学的功能、民国文学的媒体、民国文学在历史上地位或者民国文学的功能、民国文学思潮、民国作家、民国文学作品等等研究这些零部件，而构成的民国文学体系只是一种尝试，一种主张，而不是非常完备的、山呼万岁的宇宙飞行器，更无能力、无必要将其造成强加于人的圣旨。民国文学之体系的建立，各人有各自的梳理方法。如以时间为纲，史料为纬，可织就民国文学编年体系，又如用各种探究法则，可建立诸如民国

文学文体史、民国文学思潮史、民国文学作家史等等。当然有朝一日，民国文学得到认可，也一级、二级、三级学科起来，改变如今不如童养媳命运，成为“显学”（即是显摆学问），但文学庖丁们应将其做牛羊解剖，不要做猪狗阉，最后弄出个文学太监来。

三、“民国文学史”研究的展望

历来的文学史研究者自称能坐得住冷板凳，耐得住寂寞与清贫，目的在于掩饰自己成为物质上富豪的无能，宣扬自己严谨、执着的对学术挺劲，当然能做个精进的王国维式的人物实在不错。事实上绝大多数人既没有成为富豪的真本领，又很少创造精神上的精品。不过，从事研究的他们至少没有一些作家的清贫，前者不愁生计，活得甚至红光满面，盛气凌人。正因此，他们才能没有很大的后顾之忧存在于学界，能精力充沛完成赋予自己的神圣重任——挖掘文学文物、张贴文学产品标签、教训乃至鞭打作家、引航后学，更不会失职于革命、颠覆前学的史观，踢中同行胯下命根并将其驱逐出局。所以学界才热闹也就是百家争鸣了。

我们今天可以看见对 1912 年—1949 年这段文学研究的盛况：研究人员甚众，配套的硬件也不少，学位授予点、媒体、官方支持等为从事民国元年至 38 年时区研究者提供了良好的空间。因故数量上看，研究界活跃确实非常，但全是些千篇一律的面孔，优孟衣冠多得惹厌。纵使有自我标榜创新者也不排除此地无银三百两之嫌。比如很多人在媒体上注册自己有关这段文学史的字号店面，以本科学生作为客户，几年熬过了，硕士多了，博士也多了，露面次数也多了，自鸣得意的学术真空也庖殿式了，自己站在正间，不忘开辟次间、梢间、尽间。其实无论文章中字数如何增加，所出的书本多么加厚，内容腻得生烦。除非我们只读同一个人写的同一本书，或者绝对不能拿不同作者写的同一名称的书，或者同一作者不同时期写的同一内容的文本来拜读耶！原来学界精进者不多，贪吃懒做、偷懒耍滑者很多，他们是否为专事模仿、抄袭的垮掉的一代学人？

主张“民国文学史”可以给忙于现代文学、新文学、20 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人们中愿意改行者提供领地，让他们分流一部分，不要造成庙少、小僧多局面，在辛亥革命 100 周年之际，我们进行了一次人性化的、解救拥挤的学术生存问题的人道主义援助，也算是一种历史责任；同时“民国文学史”是一次革命，历来的革命口号最响，革命结果最糟。其中之一就是包含文学史在内的历史是劳动人们创造的，但这也只是理论上的空头安慰，在纸上却没有劳动人们的汗水，只有大、小知名人物的倩影，在“民国文学史”拓展

中我们能否展现一部为国民文学作出贡献的各民族人们的血汗史？

对于1912年—1949年的中国文学称呼的提出基本上完结，以后在史观上突破可能较难，此事倒有点令人担心。据说17岁就随父亲菲力二世出征的亚历山大大帝，在击败了波斯帝国后，此举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看来就快要完成征服世界的梦想了，他曾经感慨世界已经没有更多的领土来让他征服了，军队会懒惰、兵器会生锈，他本人也无用武之地！其实伟大的亚历山大大帝犯了伟大错误：他没有成立科学院，让那些院士们为他提供世界资源信息，不具备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领导素质，导致他本人没有认清世界的辽阔性；其次，他没有好好珍惜得到的疆域，并加以开发，充分发掘地利，造福于人。所谓珍惜土地利在千秋也。“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们研讨文学史者也来个“以‘亚帝’为镜，可以知深广！”我们不必像“亚帝”那样帝皇忧地。史观虽用尽了各类标签，还有空间可突破；即使史观被全部开炸也并不等于史矿的枯竭。“国民文学史”观框架下的卧室是无穷的，它等待人们整理、设计、装修成宜人的居所；它的腹地是无界的，等待后人去游览、开采。同时“国民文学史”观也是一种挑战，既欢迎前学的斧正、撞击，又希望后来者挑战，打破记录，当然拒绝海吃抄袭这样脱氢表雄酮 DeHydroEpiAndrosterone 激素之人，最后像大牌运动员卡尔·刘易斯2009年陷入兴奋剂的丑闻。

“国民文学史”虽然目前看起来还比较陌生、稚嫩，在学界并非既定的被广泛接受的说法，近期似乎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其他文学史观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位置，乃至遭遇轰击，但是随着文学史研究时、空维度的一再被突破，这一概念在学界内外，不是融化的冰山，而是冉冉长高的白鹭洲，她将逐渐被关注，乃至被接受，应是一种可预期的前景。

建立国民文学体系，让其开花，使其丰满，即使1万年后，她可能成为皱纹纵横交错的老妖，但也会让后人想起她昔日诱人轮廓的辉煌，而非没有名分、地位的衣冠冢，周围长着几根弯曲枯萎的茅草。这就是我们真正的希望所在。我们期望着一个“国民文学史年”的来临！

2011年12月29日 北京天桥

序1 写在汤溢泽《民国文学史研究》出版之际

刘曙光

一

期盼已久的元旦假期终于到了。虽然同样是放假三天，但是，与社会上从元旦开始放假不同，我们学校是从2011年的最后一天算起的。对于节假日，其实，我们早已没有了太多的奢望。只是希望能够多睡一会儿，不像平时那样太早起床。

12月31日，放假第一天早上，我还在甜美的睡梦中，忽然，手机短信铃声响起。我抓过手机看了一眼，时间是五点过六分。被铃声惊醒的夫人疑惑地问：谁呀，这么早就发短信？

不是别人，是他——汤溢泽兄。可能是从小接受并加以实践老师“一日之计在于晨”的教诲，他养成了早睡早起的习惯。他起床了，而且想念我了，自然不容我再酣睡。在短信中，他给我下达指令，给他最近要出版的《民国文学史研究》写篇序言，并且限在元旦假期完成。我翻了一下身，来不及回复，又迷迷糊糊睡着了。

等我醒来的时候，溢泽兄来电话了，叫我们北京的几个同学一聚。中午见面的时候，他又给我提起序言的事。我说，我怎么能写序言呢？对文学、文学史一窍不通，对“民国文学史”更是陌生得只在他这儿听说过。他说，随便你写吧。

虽说是假期，由于我的工作性质，接下来的两天，我是加班加点在审读稿件。写序言的事情就在九霄云外浮沉着。

二

写什么呢？

要写，就写点溢泽兄吧。

读者肯定要对我嗤之以鼻。无话找话，说些与民国文学史毫不相干的东西，这算什么序言？

这不是我的过错，是溢泽兄强人所难。元月一日、三日，接二连三收到溢泽兄短信，催促我早日完成任务，我也就把九重天外的序言事拉回来了。

再说，写溢泽兄未必就与主题无关。有孟子“知人论世”说可以为证。孟子谓万章曰：

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

这一段话，杨伯峻先生译之为：孟子对万章说道：“一个乡村的优秀人物便和那一乡村的优秀人物交朋友；全国性的优秀人物便和全国性的优秀人物交朋友；天下性的优秀人物便和天下性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认为和天下性的优秀人物交朋友还不够，便又追论古代的人物。吟咏他们的诗歌，研究他们的著作，不了解他的为人，可以吗？所以要讨论他那个时代。这就是追溯历史与古人交朋友。”^[1]

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引用这么两大段话，并不是想说交朋友要知其人，而是想说阅读一个人的著作，不仅要了解他的为人，而且要讨论他那个时代。这句话，不仅适用于《民国文学史研究》的作者汤溢泽先生，而且也适用于民国文学史中所涉及的每一个作家。对民国文学家“知人论世”，留待溢泽兄及文学史家继续探讨。毫无疑问，民国文学史，在讨论某一个作家的時候，是要论其世的。这个“世”不是别的，就是“民国”。如果说“现代”两个字是变动不居的，那么，与现代不同，“民国”是一个可以确定的历史时期，特指从1912年1月1日到1949年10月1日这38年时间；而对溢泽兄“知人论世”，我试说一二。

溢泽兄乃是真性情，敢爱敢恨，爱憎分明。受人滴水之恩，必然涌泉相报。而且严格遵照毛泽东“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教导。他又具有人格的多重性。如果从儒雅方面看，他是大学教授（其实这老伙计没有教授感觉，可以说他没把教授当回事。据传他在未为正高前，训斥自己手下犯错误的办事员蠢得像副教授，像博士，同学中有人斥责他鲁莽，溢泽答有些高知人士本本主义太多，实践里坏事不少；又有人质问他既然这样看不起副教授等，为何还要评正高？激他为何不说蠢得像教授……他答曰正高是教书先生追求的东西，他也很俗；而说蠢得像教授暂不敢，因为他未为正高……可能有点惧怕别人说他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之心态。现在他正高几年了，他指责手下人蠢得像教授了，他可以用吃了葡萄后，葡萄果然是酸的这个理论加以回击。可见他那张反儒、骂文士的嘴射出毒弹不少啊！但我推测他炮击的对象为没有真才实学的、装腔作势的水货文人。他对李白、杜

甫、曹雪芹、鲁迅等大家是很崇拜的)，儒雅下勇猛、有点智慧，风流倜傥，是文人中的文人；如果从粗俗方面看，他和我一样农民出身，又久在商场中摸爬滚打，大大咧咧，毫无顾忌，又像“流氓中的流氓”。他从不迷信权威，相信在学术上“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以往的权威也必然是“大江东去浪淘尽”，“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文如其人。溢泽兄为文，真情流露笔端，随意挥洒，直抒胸臆，不讲究曲笔，不为尊者、“伟者”讳，有时显得有些尖刻。因此，阅读溢泽兄的论著，还让我想到孟子的另一说法“以意逆志”，需要用自己切身的体会去推测作者的本意，而不要拘泥于词句误解本意。“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

三

就历史本身而言，它并没有什么自己的“意义”和“目的”。我们说前期历史的“意义”和“目的”，总是从后期历史往前追溯而做出的。其实，我们所说的是“历史中的意义”（*meaning in history*），而不是“历史的意义”（*meaning of history*）。“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得出的抽象。”^[2]而且，这种抽象本身也是历史条件的产物。我们所说的历史发展总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最后的形式总是把过去的形式看成是向着自己发展的各个阶段。

如果我们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作一部一幕一幕不断上演的、活生生的、巨型的历史剧，那么，历史认识就应该是人类全部历史活动的产物，它本身就是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因而，过去的历史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僵化的东西，它就不是死的、没有生命的思想和材料。它既以以往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又以生机勃勃的每一时代为指归。这样，历史对现实、时代的指导、借鉴作用才得以发挥。当然，这样的历史不是哪一代、哪几代、哪几十代历史学家所能写就的，每一代人都可以重写历史。对每一代的历史学家来说，他们必须继承前人历史认识和历史评价的积极成果，把它作为自己历史认识和历史评价的前提条件，并立足自己时代新的材料、新的技术、新的要求，通过能动性、创造性的消化、吸收、扬弃、创新，对迄今为止的历史作出新的认识、评价。所以，享誉世界的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说：“每个时代都要编写它自己的历史。不是因为早先的历史编写得不对，而是因为每个时代都会面对新的问题，产生新的疑问，探求新的答案……因此，我们迫切需要一部提出新的疑问并给出新的答案的新历史。”^[3]

上述原则^[4]不仅适用于民国史研究，而且适用于民国文学史研究。学术研究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学术研究的意义是为时代服务。对历史进行阶段性的划分是为了研究的方便，是简单性方法的运用。复杂性是简单性与复杂性的统一，是对简单性的整合，但不能取代简单性。即使只从这一视角看，湓泽兄书写《民国文学史研究》也是构建整部文学史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工作。

2012年1月3日 北京大学

注释：

[1] 参见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51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88页。

[3] [美] 斯塔夫里阿诺斯：《致读者：为什么需要一部21世纪的全球通史？》，载《全球通史：从史前史到21世纪》，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 以上两段请参见拙文《历史认识的客观性与主体性》，载《社会科学论坛》2008年12月上。

序 2

杨建华

前些时候，我参加某现代文学会议，查看名单，竟来了三个“建华”，戏笑之余不禁对父辈命名方式的简单、机械乃至随意生出不满。但要改变一个自己久用的名字却不容易，当然也不敢轻易尝试。因为这么多年过来了，老师朋友家人都叫惯了这一名字，朴实而有“华”，或者建设大中华，改成什么更现代新潮的“比杰”或“比尔登杰奥”（*Buliding China* 的音译简称）之类也着实不必要。毕竟人名只是一个符号而已，谁也不会刻意推究它与实物本体的内容关联性。然而推及其他事物的命名，我们就不能不小心了。自古以来，任何实物的命名和正名都是一个令先哲们头疼的问题。中国先秦就有“名实之辨”，孔子曾指出“正名”的意义，荀子也提出“名定而实辨”，正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中国古人如此重视“正名”问题，足见名实之辨并非只是一个逻辑问题，它更透露一种社会、文化乃至政治上的复合影响。

再看中国文学史，一直是以朝代为序命名的，如两汉文学、唐代文学、明清文学等皆是如此，但编写到 20 世纪初叶以后，急转弯超车突然变成“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或者干脆称为“新文学”了。这种替换断代命名的方式，显然强调的是现代人在文学史表达上的政治、思想等方面的优越感。这么多年过去了，大家都这么张口就来，闭口而念，但很少有人想过这种称谓所包含的不合理因素。事实上，这种借助政治思想强力割裂文学史的做法，已造成了体例上的混乱，这在政治统率一切的年代是不得不如此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命名及分期越来越受到质疑，其合法性已出现危机。从 1985 年钱理群等人提出的“20 世纪中国文学”所引发的讨论，到 1986 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的“近代、现代、当代文学分期讨论会”，再到近年在北京、武汉等地多次展开的“学科史、研究方法”研讨会，我们都看到了这种冠以“现代性”称谓的文学史面临的尴尬处境。其他方面且不说，单就时间机制而言，现代文学短短的“现代三十年”与“现代”一词时间视域的无止境之间的裂痕就无法弥合，诚如一位学者所

言：“如果把‘现代’作为一个永远没有穷尽的命名，试想过几百年、几千年之后，‘现代’就会有不断更新的时间边界，因为它是一个可以被无限延伸和扩大的概念，最后可能造成时间逻辑上的混乱。”

所以，我十分赞同以一种更准确、更简明的称谓替代“现代文学史”这一称谓。于是，就有学者提出回到以朝代为序命名，即将1912年起至1949年的文学称为“中华民国文学史”（简称“民国文学史”），而将1949年至今的文学史称为“共和国文学史”，这未尝不是一种简单有效的正名方式。汤溢泽兄的这本书，就是从这个起点出发的。

以“民国文学史”替代“现代文学史”的称谓，其优点在于一是能有力地促进中国文学谱系的完整化，从而将历代文学史的时序线索完整地连接；二是能有效地避免纷纭众多的现代性称谓对文学史真相的挤兑，从而廓清研究对象，梳理出清晰的文学版图；三是能尽快建构起完整的中华民国史体系，在民国科技史、思想史、政治史以及军事史之后楔入完整的“民国文学史”，使之浑然一体。这一切已在汤兄这本书中阐述得甚为详细。

但仅有这种对“民国文学史”的优越性认识显然还远远不够，这种理论上必要性的解释毕竟不能必然地推出“民国文学史”最终正名，进而取代流行的“现代文学史”等。根据本人的浅陋认识，“民国文学史”要想扶成正室，还必须跨过后述的几大现实性的门槛：一是必须有文化权威部门自上而下地进行号召与提倡，毕竟以最近一个世纪文学为研究对象的机构、组织都或多或少地依附于官方；二是各高校、各研究机构必须打破先入为主的惯性思维，确保“民国文学史”的讨论充分展开，并就“民国文学史”的框架体系达成共识；三是各中文专业的本科和研究生教学上所采用的教材也必须与“民国文学史”理念一致，不必总往现代性、进化论上靠。现在看来，虽然“民国文学史”的提出将近10年，但研究进程似乎还停留在起步阶段，撇开其中的客观因素，学者们在浮躁的学术环境下难以保持枯坐冷板凳的平常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主观原因。

也正是在这种天下熙熙又攘攘的物欲化大背景下，汤溢泽以十二分的清醒与执著、二十四分的大胆、四十八分的细心爬梳剔抉各种史料，先后写下《论开展“民国文学史”研究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以“民国文学史”替代“新文学”史考》、《论开展“民国文学史”研究的迫切性》、《文学史观的失误与拯救》等论文，疏浚文学史研究过于堵塞的河床，体现出了当代学者独到的学术眼光和无畏的学术勇气。

最近研读散文随笔，偶然看到周国平的散文《论真实》，周先生认为：

天赋，才能，眼光，魄力，这一切都还不是伟大，必须加上真实，才成

其伟大。真实是一切伟人的共同特征，它源自对人性的真切了解，并由此产生一种面对自己、面对他人的诚实和坦然。

与汤溢泽兄交往多年，亦师亦友，留给我最深刻印象的不仅仅是他的天赋，才能，眼光，魄力，而且是他的“真实”：贫寒时候忍受势利眼的恶搞而他不屈不挠，艰难行走于教学、策划，脱贫后淡定势利眼梦追的财富而他继续低调前行，精确安排时间放马学界，善待真诚真心的（而非表里不一的）朋友，没有纸上谈兵式的、而是豪迈进取（有时可能是排山倒海的人世，比如他要私修民国史，又如他精打细算正在建立一个庞大的1000多万棵楠木园，保护濒危珍贵树木几十种）等等。在战争年代，只凭我推测他要么是被子弹嘎一声毙命马革裹尸，要么是个指挥千军万马凶将、猛帅乃至勤勉的统帅；在和平年代，他能文能商。他商得歪招迭出，他出手勇猛，以精锐数十人组建世界上最小的商海野战司令部，稳准狠地在干同行中不凡的事儿；文得令我们不知所措，他发表过杂文、出版小说《白云岫》，他从指摘小小的龙应台文章的瑕疵、到第一批抨击区区的余秋雨、再系统透视红得发紫的钱锺书、到现在推出这本《民国文学史研究》，他在努力攻破越来越高的学术堡垒，一路汗水，颇有斩获。虽然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缺点，有人也可以用“急就章”视之，关键是很多人没有急出来，是不屑还是无能？抑或没想到或者想到又没做到？

那么汤兄为何产品迭出？重拳出击？据我们观察，他生活很有规律性：赤脚跑步、冷水浴身、按时作休等等，没有一般文人夸夸其谈、打牌、闲聊等嗜好，他的时间就是这样恰到好处地整合。这是什么精神？是强悍文人气质泛出虎威的、成功的钉子精神，在全国上下麻将战、牌战硝烟弥漫的今天，他“土”得连字牌、麻将也不认识，只知道干事干事，他是一根楔入学术内核的、膨胀的不锈钢钉；这是何种案例？是贫寒文人解放、解救自我的典型，在有权者操控资源，无权者尤其出身贫寒的我们埋怨待遇太低，挣扎生存时候，他成功地开辟了一条亦文亦商的康庄大道，这是值得我们效法的。他没有附骥于任何权势，不像某些所谓的学术上生产组长或包工头（如某些学术带头人）上舔上司、社科规划办官员、评委成员等脚趾，下踩弱勢的同事、学生，谁不知他们在外做出的一副光鲜学者样子掩盖着他们摇尾乞怜的腐木心？而汤兄靠的是务实的经营，自己进入滚滚市场找饭吃，把得来的部分资金垫做研究的开支。他敢想就敢做，一做真像那么回事，就是别人评判乃至恶意攻击的这些“急就章”，则刚好掀翻我们很多学人的裤子或者围裙，露出短视、懒惰等屁股。我说的这些好像是广告植入，但现实的汤溢泽确实如此，我衷心祝愿他在文学、种植艺术、金钱崎岖的山道上自由舞蹈时取得成功，也希